

姚鼐诗文集刻印研究*

黄 汉

内容摘要:嘉庆初年,姚鼐手订、刊刻、增补诗集十卷与文集十六卷,付之江宁刘文奎家雕刻,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印本。其后,李际春补刻诗外集,姚维续刻诗后集,梅曾亮续刻文后集,又有姚原绂翻刻印行诗文集。道光以降,诗文集流传产生了“全集”的形式。同治五年,李瀚章因《惜抱轩全集》书板毁于兵燹,故重作校勘,另刻新本,是为省心阁本。此本有原刻与翻刻之分,原刻亦有初印和后印之别。翻刻本不仅改正了原刻后印本许多错讹,而且刊刻更为精良,上海校经山房、会文书局皆据之印行出版。徐宗亮又因省心阁本“翻雕于楚而不常印行海内”,故取文集别为校刊。目前学界普遍使用的《惜抱轩诗文集》,实据省心阁本之原刻后印本整理而成,故书中错讹甚多。姚门弟子校阅、助刻姚鼐诗文集,诗文集反过来又滋养了一批又一批姚门弟子,吸引了众多读者依附姚门。

关键词:姚鼐 诗文集 刊刻 印本 姚学

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规模最大、影响最深远的流派,对于其创始者姚鼐,学界研究成果颇丰^①,但迄今为止,仍无专门对姚鼐诗文集刊刻、版本的研究。前人虽于《惜抱轩诗文集》版本有一定的认识^②,但对各版本尚缺乏深

*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“姚鼐年谱长编”(20YJC751016)的阶段成果。

① 王达敏:《姚鼐与乾嘉学派》导论,学苑出版社,2007年,第1页。

② 刘季高认为省心阁本错讹较多,校经山房本稍加校正(刘季高:《重刊〈惜抱轩全集〉前言》,《江淮论坛》1989年第4期,第99页;姚鼐著,刘季高标校:《惜抱轩诗文集·前言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2年,第9-10页)。傅璇琮主编、马亚中分册主编《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·明清卷》较为详晰地介绍了《惜抱轩诗文集》等书的版本及收藏地(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9年,第370-373页)。徐成志、王思豪主编《桐城派文集叙录》论及姚鼐生平、著述版本概貌(安徽大学出版社,2016年,第347-350页)。周中明(转下页)

入辨析,往往有因过信内封而误判刻印年代、不明版本源流而误校文字等问题。而且姚鼐诗文集的刻印又是一个复杂、漫长的过程,版本间差异或为姚鼐手订,或是流传中致误。因此,十分有必要对嘉庆以来姚鼐诗文集的刊刻、版本做一番细致的探讨。既要厘清姚鼐编刻及姚原绂、李际春、姚雉、梅曾亮诸弟子翻刻、续刻诗文集等过程,又要详考原刻本、翻刻本、初印本、后印本诸种之面貌、差异以及成因,揭橥诗文集刻印的细节,订正已有认识的讹误。

一、姚鼐编刻《惜抱轩诗集》

清中叶,汉宋之风激荡,尊崇宋学的姚鼐裹挟其中,与汉学辩难论争,最终辞别京城,讲学东南,构建文统。以乾隆五十四年(1789)主讲钟山书院为界,“此前,姚鼐绛帐寂寂,追随者极稀;此后,姚门知名传法弟子次第来归”^①。“四方贤俊,自达官以至学人士,过先生所,在,必求见焉”^②。乾隆五十五年(1790),新城陈用光向姚鼐投书求教,后四年至江宁侍于帐下,成为日后传播姚学的首要人物。而自乾隆五十七年始,陈用光便对姚氏著作刊刻颇为用心,开始刻印《春秋说》《春秋三传补注》,并存意为之编刻文集。然姚鼐意欲先传经说,“诗文宜俟身后耳”^③。嘉庆二年(1797)秋,《九经说》《春秋三传补注》刻成,此时姚鼐想法发生变化,写信与陈用光,以为文章著述当身前自定之,“顷自定诗集十卷”^④,付诸刊刻^⑤,计明年秋可以成工。嘉

(接上页)整理姚鼐著作时,于前言罗列了姚鼐著作版本情况(姚鼐撰,周中明校点:《姚鼐诗文集》,黄山书社,2021年,第21-22页)。《桐城派大辞典》亦简单列举《惜抱轩诗集》等书的情况(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,2021年,第508-509页)。但是以上著述,都对姚鼐诗文集刊刻、版本作较深入地探析,且部分观点有所疏失。

①王达敏:《姚鼐与乾嘉学派》第八章《桐城学人群体的形成》,第197页。

②姚莹:《东溟文集》卷六《朝议大夫刑部郎中加四品衔从祖惜抱先生行状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549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年,第374页。

③姚鼐:《惜抱轩尺牍》卷五《与陈硕士》,卢坡:《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》,安徽大学出版社,2020年,第218页。

④姚鼐:《惜抱轩尺牍》卷五《与陈硕士》,第223页。

⑤《惜抱轩诗集》虽是嘉庆时期始在江宁刊刻,但姚鼐编订诗集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乾隆三十一年(1766)。姚鼐信云:“鼐丙戌年春,曾有两字奉寄,并诗一册,呈乞阅定者。”刘大櫟回信称:“《得五楼诗稿》一卷,久为标录一过。”此时诗集抄编为一卷,初名《得五楼诗稿》。详参姚鼐撰,卢坡、黄汉整理:《姚鼐师友门人往还信札汇编》,凤凰出版社,2022年,第3页。

庆三年五月,诗集十卷在江宁刻成^①,定名作《惜抱轩诗集》^②。八月,姚鼐游览吴越,“作古今体诗四十馀首,拟明年以补入集中”^③。嘉庆四年九月十五日,“鼐诗补刻五卷、十卷之半,甫付之”^④。秋间,《惜抱轩诗集》补刻工作完成^⑤。

目前所见江宁刘文奎家镌原刻本《惜抱轩诗集》有三种印本:^⑥(1)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《惜抱轩诗集》2册,索书号:99341。封面有题识“桐城姚姬传先生诗集,乙未中秋海上后学王庆勋叔彝氏读于吉金乐石居之灯下”,次叶内封题“嘉庆戊午镌,惜抱轩诗集”,目录末行刻“宣城张炯、承德孙冯翼,江宁程有恒、吴刚校”。半叶10行,行21字。黑口,单鱼尾,左右双边。框高17.8厘米,宽12.5厘米。版心鱼尾下题“惜抱轩诗集”及卷次、叶码。钤“叔彝氏”“上海王庆勋家藏过”等印。全书终于卷十第十叶《寒食雨》,书尾刻有“江宁刘文奎家镌”一行。(2)北京大学图书馆藏《惜抱轩文集》4册,索书号:LX/5258,前2册为《惜抱轩文集》十六卷,后2册为《惜抱轩诗集》十卷、《惜抱轩诗后集》一卷。此本卷首内封及正文版式、行款、字体等皆与国图本相同,框高18厘米,宽12.6厘米。钤“江山刘履芬彦清手收得”“刘履芬字彦清”等印。较之国图本,卷五多《题谢蕴山方伯苏潭图》等诗11题11首、卷十多《哭钱侍御沅三十二韵》等诗35题42首。(3)首都图书馆藏《惜抱轩十种》24册,馆藏号:乙四11。第9-12册为《惜抱轩诗集》,末册合装《惜抱轩诗外集》《惜抱轩诗后集》。此本卷首内封及正文版式、行款、字体等皆与北大本相同,惟卷九《题李仙枝四友图》剗改作《题李抱棧山人四友图》、卷末多《题李孝曾海上钓鳌图》1题2首。

国图本版面整洁,字迹清晰均匀、刀法锋棱毕具、版框界线完整,且墨色

①姚鼐:《惜抱轩尺牍》卷五《与陈硕士》,第225-226页。

②姚鼐撰,姚永朴训纂,宋效永校点:《惜抱轩诗集训纂·序》,黄山书社,2001年,第1页。

③姚鼐:《惜抱轩尺牍》卷五《与陈硕士》,第227页。

④姚鼐:《惜抱轩尺牍》卷五《与陈硕士》,第230页。按:此处标点,引用时有所改动。

⑤姚鼐:《惜抱先生尺牍补编》卷二《与方植之》,第448页。

⑥笔者撰写此文时,调查了中国国家图书馆、首都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安徽省图书馆、天津图书馆、山东省图书馆等地藏本,举例时选取其中较为典型的印本。为便于行文,下文所提及各图书馆藏本,简称为“国图本”“首图本”“北大本”“天图本”“山图本”等。所引姚鼐诗文集内容,皆据正文中相应版本。因集中组诗多无小题,故统计时皆以大题为准。下不一一注明。

莹润、用纸相对考究,应是初印本^①。又因此本不载姚鼐嘉庆三年游览吴越所作诗,知其刻成于嘉庆三年五月。清点此本诗作数量,惟卷五目录记载与所收诗作数量不符。目录称“古体十五首”,实有诗 15 题 16 首。第 15 诗《赠孙雨窗》“谓当海内同一情,更召木工急雕印”,姚永朴云:“案《年谱》:嘉庆二年,先生自定诗集十卷付梓,次年夏刻成。据此诗,则费出雨窗也。《年谱》又云:四年,补刻诗集五卷、十卷之半^②。五卷初止于此篇,后乃三年至四年诗,其皆补刻者与?”^③姚永朴所言“初止”“补刻”确有其事,但二者的具体时间需进一步分析。第 16 诗《硕士约过舍久俟不至余将渡江留书与之成六十六韵》刻自本卷第八叶 b 面第 1 行,有句云“敦牂岁三月……欲发不能决”,姚永朴言“此嘉庆三年戊午在桐城作。云渡江者,将往金陵也”^④。又嘉庆三年春,姚鼐写信给陈用光称“拟于二月廿四五赴江宁,石士能于此前至,乃佳也”^⑤,则此诗作于三月初姚鼐将舟发金陵之时。卷十第 50 诗为《挽袁简斋四首》,袁枚亡于嘉庆二年(1797)十一月十六日,姚鼐于嘉庆三年初春得知此讯^⑥,挽诗应作于此间。此时《诗集》已付刻^⑦,姚鼐正拟往金陵。第 51 诗为《嘉庆戊午二月十一日携持衡……因作二首》作于嘉庆三年二月,第 52 诗《寒食雨》为嘉庆三年姚鼐怀念陈用光所作^⑧,题称“寒食雨”,又有“三

①黄永年、贾二强撰集《清代版本图录》第 3 册著录“《惜抱轩诗集》十卷”,云:“此为原刻初印,目录末尾题‘宣城张炯承德孙冯翼江宁程有恒吴刚校’,书尾有‘江宁刘文奎家鏤’一行。后印本卷五、卷九、卷十均增刻诗篇。”(浙江人民出版社,1997 年,第 12 页)关于试印本、初印本、后印本等概念及判定,详参郭立暄:《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》,中西书局,2015 年。笔者撰写论文时,对书中所载方法等加以学习与利用,特此感谢。

②此句原标点作“四年,补刻诗集五卷。十卷之半五卷初止于此篇”,实则有误,详见下文。

③姚鼐撰,姚永朴训纂,宋效永校点:《惜抱轩诗集训纂》卷五《赠孙雨窗》,第 251 页。按:姚永朴所见为卷五、卷九、卷十已增刻之《惜抱轩诗集》,故推测曰“皆补刻者与”。

④姚鼐撰,姚永朴训纂,宋效永校点:《惜抱轩诗集训纂》卷五《硕士约过舍久俟不至余将渡江留书与之成六十六韵》,第 253 页。

⑤姚鼐:《惜抱轩尺牍》卷五《与陈硕士》,第 224 页。按:姚鼐写信时,尚未动身,故言“拟于二月廿四五”,而诗云“三月”,则是赴江宁之实际日期。

⑥姚鼐:《惜抱轩尺牍》卷五《与陈硕士》,第 224 页。按:《惜抱轩文集》卷十三《袁随园墓志铭并序》载袁氏卒于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,与姚鼐书信所言稍有不同。

⑦姚鼐:《惜抱轩尺牍》卷五《与陈硕士》,第 223 页。

⑧徐璈辑录,杨怀志、江小角、吴晓国点校:《桐旧集》第 2 册,安徽大学出版社,2016 年,第 279 页。

月春晚悲老物”句,则应作于本年三月。所以,嘉庆二年,姚鼐手订《诗集》,卷五实止于第15诗《赠孙雨窗》,卷十应止于第49诗《仇英熏笼宫女手持团扇》。次年三月,姚鼐往金陵,又将近作《硕士约过舍久俟不至余将渡江留书与之成六十六韵》增刻入卷五,《挽袁简斋四首》《嘉庆戊午二月十一日携持衡……因作二首》《寒食雨》增刻入卷十。卷五目录“古体十五首”应是嘉庆二年姚鼐手订时数量,实收16首诗则因嘉庆三年补刻所致^①。卷十目录“今体五十二首”,亦是嘉庆三年增刻后的实际数量。

北大本卷五所多11首诗中《戊午九月十四日出云栖寺作》等数首,与卷十所多42首诗中《晓过苏堤作》等数首,多为嘉庆三年中秋后姚鼐游览吴越所作。卷五末首《题外甥马器之长夏校经图》,姚永朴考证作于嘉庆四年秋^②。卷十第93首《哭陈东浦方伯三十二韵》,据《惜抱轩文集》卷十三《江苏布政使德化陈公墓志铭并序》可知,陈东浦嘉庆四年正月卒于苏州,“鼐为东浦先生欲竭思,或文或诗,必成其一,乃能发区区之意”^③,则此诗应作于春间。第94首为《孙渊如观察万卷归装图》,嘉庆四年六月二十八日,姚鼐曾为孙星衍作《孙文介公殿试卷跋尾》,此诗或作于同时。嘉庆三年,姚鼐便有意将当时所作于明年补入集中。嘉庆四年秋,补刻《诗集》五卷、十卷之半,正与此本卷五、卷十补刻诗作相合,故此本应补刻、印行于嘉庆四年秋间。

国图本、北大本目录均称“第九卷,今体一百十首”,但首图本卷九多出《题李孝曾海上钓鳌图》1题2首,共计102首。姚永朴考证称:“此诗以次观之,当作于嘉庆元年。然李君《寄鸿堂集》有《图说》,自云:‘绘于嘉庆丙子。’丙子为二十一年,先生已卒矣,安得取图题之?必是先有此图,丙子乃重绘者耳。”^④《题李孝曾海上钓鳌图》系后来增刻,能否与本卷其余诗作一起“以次观之”,尚待考察,且李宗传《海上钓鳌图说》并未言及重绘之事。是文云:“嘉庆丙子岁,余客罗溪,有长史来自金陵,以绘图请。余故无意为此也,漫应曰:‘作《海上钓鳌图》可乎?’图成,自号曰海颿。越二年,就官浙江。浙西观海处曰乍浦,其东曰招宝山,余皆骋望其地。至温州飞云渡,则又尝以民事乘海舶,泛重洋而归。凡海上景光领略殆尽,似绘图有豫为缘者。……且余

①姚鼐诗集各印本中卷五、卷九、卷十实际数量与目录多有不符,应是由补刻后未及时挖改目录,或清点诗作数量有误所致。文集中亦有此现象,不再一一说明。

②姚鼐撰,姚永朴训纂,宋效永校点:《惜抱轩诗集训纂》卷五《题外甥马器之长夏校经图》,第272页。

③姚鼐:《惜抱先生尺牍补编》卷二《与马雨耕》,第433页。

④姚鼐撰,姚永朴训纂,宋效永校点:《惜抱轩诗集训纂》卷九《题李孝曾海上钓鳌图》,第440页。

年逾四十,家贫,出就升斗禄以养亲,固所愿也。”^①李宗传生于乾隆丁亥年(1767)五月初七日^②,嘉庆丙子(1816)年五十,越二年年五十二,与“年逾四十”不合,则“丙子”并非绘图之年。反以“年逾四十”推之,李宗传就官、写作《图说》应在嘉庆十二年(1807)至嘉庆二十二年(1817)之间,《海上钓鳌图》应绘于嘉庆十年(1805)至嘉庆二十年(1815)之间。

又李宗传《寄鸿堂诗稿》以时编次,卷二首诗为《初就官浙江次殷春园(荣)登吴山韵》^③,后数首皆为游览吴越所作,其后次有《内子初度却寄》《由蚕城之甬上》(首联:立秋二日秋风生,晓别会稽甬东行)、《曹娥江》《甬江》《夜抵甬东城》《客馆》《自淡江至镇海县》《同白渔安登招宝山望海楼》《题望海楼》《海上待月》《过富春滩》,正与《海上钓鳌图说》所云“就官浙江”、登招宝山、领略海上景光相合。继又有《除夕和屠菴渚(本仁)韵》《三月四日同……三岩观瀑》《夏日饮族叔(永盛)山庄》《秋思》《雪中望九华山》诸诗,则本卷所记两年事也。卷三首诗为《再至浙江怀姬传先生》,后有《重阳旅次》《乙亥重九后一日白鱼庵大令饯余于龙山海观亭,时将有雁荡之行,而渔庵以为返杭也》《丙子五月……依韵答之》,知李宗传曾两至浙江,后一次为嘉庆乙亥(1815)。而《图说》所记当为李宗传初官浙江时,即至晚在嘉庆十八年(1813);则《海上钓鳌图》至晚绘于嘉庆十六年(1811),姚鼐自然能题咏其图。

姚鼐生前仅就《诗集》“补刻五卷、十卷之半”,并未补刻卷九。刊成《诗集》后,复有题赠酬答之作,而“往往手写付人,不自留稿”。其子姚雉“日侍案侧,见有所作,辄私录成编”,嘉庆二十一年(1816)刊成《惜抱轩诗后集》^④。《题李孝曾海上钓鳌图》理应收录而未收入《后集》,应是别有用心,而这又与本卷《题李仙枝四友图》剗改不无关系。李仙枝,字宝树,号抱犊山人,曾游刘大槐之门,为李宗传之伯父。剗改诗题作《题李抱犊山人四友图》,以李氏之号代其名,更示尊重。李宗传作为姚鼐弟子,增刻《题李孝曾海上钓鳌图》入卷九,既与《题李仙枝四友图》相呼应,又与本卷末《题朱涵斋都统便面洛神兼临十三行》相类。至于增刻和剗改工作,应就在姚雉刊刻

①李宗传:《寄鸿堂文集》卷一《海上钓鳌图说》,清同治三年(1864)刻本,天津图书馆藏,叶三至四。

②李杜朝纂修:《崧城李氏宗谱》卷十,民国九年(1920)活字本,叶七十七。

③李宗传:《寄鸿堂诗集》卷二,稿本,北京大学图书馆藏。

④有关姚雉编刻《惜抱轩诗后集》情况,详见本文第四部分。

《惜抱轩诗后集》的嘉庆二十一年^①。

要之,嘉庆二年秋冬间,姚鼐手订《惜抱轩诗集》十卷,付之刊刻。嘉庆三年三月,姚鼐往金陵后,又将近作《硕士约过舍久俟不至余将渡江留书与之成六十六韵》《挽袁简斋四首》等分别增补入卷五、卷十。五月,书成,收诗566题600首,是为《诗集》原刻初印本,姚鼐将之寄与弟子陈用光、胡虔等人^②。八月,姚鼐游览吴越,作诗四十馀首。次年秋,姚鼐编选古体诗11题11首、今体诗35题42首,再次分别增补入卷五、卷十,共收诗612题653首,是为北大本为代表的中印本。嘉庆二十一年,诗集卷九删改《题李仙枝四友图》作《题李抱犊山人四友图》,又增刻《题李孝曾海上钓鳌图》1题2首,形成了今日所见以首图本为代表的后印本,共收诗613题655首。

二、姚鼐编刻《惜抱轩文集》

《惜抱轩文集》最早由姚鼐弟子陈用光在乾隆五十七年(1792)刊刻,共十卷^③。后陈用光携之至京,为钱大昕、王芑孙等人所见。姚鼐因集中部分文章不佳,叮嘱陈用光勿更印传播,“故今绝无此本子”^④。该十卷本,大抵依文体而分,有书、序、传等,收《史文靖墓志》《朱竹君传》等文^⑤。嘉庆二年

①若《题李孝曾海上钓鳌图》在《惜抱轩诗后集》刊刻后发现,那么补刻时应入《后集》。

即便补入《惜抱轩诗集》,亦不需删改《题李仙枝四友图》。

②有关《惜抱轩诗文集》寄赠问题,可参看卢坡:《作为礼物的书籍:姚鼐赠书与桐城派的流传》,《长江学术》2023年第2期,第73-83页。

③姚鼐:《惜抱轩尺牍》卷五《与陈硕士》,第217-218页。

④姚鼐:《惜抱先生书信》卷一《复秦小岍书》,第30页。

⑤笔者写完此文后,偶然发现一部姚永概过录批点本《惜抱轩诗文集》,《文集》目录末有墨笔识语云:“道光丁未夏四月,假少鹤所藏梅言翁批点本照录一过。言翁所阅为新城陈侍郎初刻本,凡为古文八十九篇,《经说》四种(《春秋》《左传》《公羊》《谷梁》)。其文较全集尚未及其半,今题下有单点标识者也,间有互异处用墨笔注之,庶以见删定之苦心云。时五月旬有四日,翰臣校讎并识。”“丁巳见唐天如逢录本,借临一周,十二月初三日永概时客京师二龙坑,与仲兄同寓也。”此批点本保留陈用光所刻《惜抱轩文集》篇目及异文。陈用光所刻共收文八十九篇,其中八十七篇见于姚鼐所刻《文集》,一篇为已删之《史文靖墓志》,余一不知为何。此外,与姚鼐刻本相较,又有五十馀处异文。具体篇目及文字差异,见笔者所整理《姚鼐集》,中华书局,2023年,待出版。值得注意的是,《惜抱轩文后集》虽为姚鼐弟子刊刻,然其文原为姚鼐抄寄。笔者整理《惜抱轩文后集》时,将卷一序文对校相应文集卷首序文,文字差异较大,且态度观点亦有不同,知姚鼐并非单纯抄录,实则有所修改删定。

(1797),姚鼐手订《文集》二十卷,时并未付之刊刻。嘉庆五年十月前后,《文集》被姚鼐删定为十六卷,张烜、孙冯翼、程有恒、吴刚、孙金相、伍光瑜、谈承基、焦若钐、唐大沛、吴翼元等十位姚门弟子合为校刻,“约二三月可以成功”^①。嘉庆六年,姚鼐因年衰畏涉江涛,辞去钟山书院之职而主讲敬敷书院。秋,姚鼐居安庆时,“古文已刻就,正在校改,未印出”^②。此时已有《文集》试印本寄至安庆,姚鼐阅览一过,将所需修改的数叶发回江宁用以剜改。

嘉庆七年早春,姚鼐尚在桐城时,写信给陈用光云:“《文集》刻成,而残缺数页,至今不曾补来,故且未寄京。俟得,即寄来也。”^③此札尤值得琢磨,“至今”正指从嘉庆六年秋《文集》刻成始至此时,“不曾补来”的“残缺数页”当“正在校改”^④。本年秋冬之际,姚鼐更以新刻《文集》三部奉寄陈用光^⑤。信中所云“更”字是“再、又”之意,这表明姚鼐在此之前曾寄《文集》给陈用光,结合上文“故且未寄京。俟得,即寄来也”,则此次所寄正是在试印本基础上校改数叶的正式印本。又《与胡雏君》云:“入春来想佳好……鼐冬间大病几死,今愈……文集刻成,今以一部奉寄,又二部以寄蕴山、虬御也。”^⑥嘉庆六年冬姚鼐得病,信云“入春”,当作于嘉庆七年春间。此时姚鼐在安庆寄书给胡虔、谢启昆、张元祜,则《文集》应于本年春间校改完成,正式刊印流通。

目前所见江宁刘文奎家镌原刻本《文集》有两种印本:(1)中国国家图书馆藏《惜抱轩文集》8册,馆藏书号:96397。内封题“嘉庆辛酉镌,惜抱轩文集”,并有题记“嘉庆十一年丙寅九月桐城汪学山(学山号均之)见赠,昭文邵广融见赠”,目录末行刻“江宁刘文奎家镌”。半叶10行,行21字。黑口,单鱼尾,左右双边。框高17.8厘米,宽12.5厘米。版心题“惜抱轩文集”,并

①姚鼐:《惜抱轩尺牍》卷五《与陈硕士》,第236页。“文集为江宁诸君镂板,云四月必成工,共十六卷,待得之可奉寄也。”(姚鼐:《惜抱轩尺牍》卷三《与胡雏君》,第135页)

②姚鼐:《惜抱轩尺牍》卷六《与陈硕士》,第240页。按:此“古文”应指《惜抱轩文集》,乾隆五十七年姚鼐写信给陈用光时称其所刻《文集》为“《古文》十卷”,此时《古文辞类纂》尚是抄本,不当言“刻就”。又此札云“未印出”,应指尚未正式大量刊印,但印有一定数量的样本,供校正文字之用。

③姚鼐:《惜抱轩尺牍》卷六《与陈硕士》,第241页。

④这里的“残缺数页”不可能指下文姚鼐要修改《汉庐江九江二郡沿革考》及补入《节孝张孺人传》等5篇传文的数页,因为此时姚鼐尚居桐城,还未参与纂修《庐州府志》、撰写《节孝张孺人传》等传文。

⑤姚鼐:《惜抱轩尺牍》卷六《与陈硕士》,第243页。

⑥姚鼐:《惜抱轩尺牍》卷三《与胡雏君》,第135页。

有卷次、叶码。钤“琴川邵氏劫餘行笈书画”“邵广融印”“匏风”“见素抱朴”“于人必有所济”等印。(2)北京大学图书馆藏《惜抱轩诗文集》4册,索书号:LX/5258,前2册为《惜抱轩文集》十六卷。此本卷首内封及正文版式、行款、字体等皆与国图本相同,框高17.9厘米,宽12.8厘米。钤“江山刘履芬彦清手收得”“刘履芬字彦清”等印。较之国图本,卷十多出5篇传文、部分文章内容有异^①。

从外观形式来看,国图本版框完整、字迹清晰,应是初印本;北大本板框偶有残损,当为后印本。从文字内容着眼,国图本与北大本的主要差异体现在增补篇目与修改文字两方面。分析这些差异,既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不同印本的性质与联系,又有利于探究姚鼐为何修改增补《文集》。

北大本卷十较之国图本多收《节孝张孺人传》《何季甄家传》《陈谨斋家传》《方染露传》《程养斋暨子心之家传》。《节孝张孺人传》文末云:“及嘉庆辛酉科,其子世昌,亦举顺天乡试,而孺人于是年遂卒……次年世昌成进士,改庶吉士。”辛酉为嘉庆六年,知张孺人之子孙世昌于嘉庆六、七年连中举人、进士。其改庶吉士,据《清仁宗实录》,在七年五月之后,则此文当作于该年五月之后。《姚惜抱先生年谱》所附《文目编年》亦系此文于嘉庆七年,其下注云:“此文壬戌作,今乃在前集,当是刻成后补入也。”^②何季甄,即何思钧,嘉庆六年去世。至迟在本年十月二十八日,姚鼐从姚景衡书信知何氏已逝^③。嘉庆七年,何元烺、何道生致信姚鼐,请求为其父作传。八月二十八日,姚鼐回信称“前得书,具审大事办理已毕,甚善甚善……所须尊公家传,已为具草。虽不能佳,却字字真实也”^④。信中“尊公家传”即《何季甄家传》,则此传成于嘉庆七年八月之前。《陈谨斋家传》《方染露传》《程养斋暨

①山东省图书馆藏《惜抱轩全集》20册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53册、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77册据以影印《惜抱轩诗文集》共5种。此所收《惜抱轩文集》与北大本版式、行款、字体、内容皆同,但内封题“嘉庆戊午镌,惜抱轩文集”,次叶为校阅门人姓氏。此本内封往往使人以为《文集》有嘉庆三年版本,而《文集》嘉庆六年方刻成,故“嘉庆戊午镌”是错误的。将此内封与所收《诗集》内封相比较,版框尺寸、形制以及“嘉庆戊午镌、惜抱轩”8字字体全部相同。之所以如此,应是后人整体挖去《诗集》内封版片中“诗集”二字,补刻“文集”二字嵌入原版,印刷而成《文集》内封,两内封版框缺损处及部分字体完全相同即是明证。此本残损严重,应是更后印本。

②郑福照:《姚惜抱先生年谱》,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》第107册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1999年,第637页。

③姚鼐:《惜抱轩尺牍续补·与何砚农兰士》,第530页。

④姚鼐撰,卢坡、黄汉整理:《姚鼐师友门人往还信札汇编》,第328页。

子心之家传》等文,撰作时间尚不可考。

修改文字主要有《汉庐江九江二郡沿革考》《食旧堂集序》《左仲郢浮渡诗序》等篇目,如卷二《汉庐江九江二郡沿革考》(以下简称“《沿革考》”),北大本内容较详,有明显的修改与润色,文字差异列表 1 如下:

表 1

国图本	北大本
舒 盖得今舒城南、桐城北及庐江县地。《左传》杜注:“庐江舒县西南有桐乡。”又云:“庐江南有舒城。”按:庐江郡治舒,而云“南有舒城”者,三国兵争,旧治已坏,晋徙治于汉县北故也。汉、晋置舒,皆当孔道。六朝畏北兵,又迁僻地。宋之舒治,徙益东南,疑今庐江县矣。隋因之,改县与郡同名。唐又因之。故章怀《后汉书注》云:“舒故城在今庐江县西。”以杜注、章怀之言度之:汉舒治今桐城之北,晋舒治今舒城,六朝舒治今庐江。隋无舒。唐开元后复置舒,略当晋故城地。宋、元、明因之。	舒 盖得今舒城南、桐城北及庐江西地。《左传》杜注:“庐江舒县西南有桐乡。”又云:“庐江南有舒城。”按:庐江郡治舒,而云“南有舒城”者,三国兵争,旧治已坏,魏、晋徙舒郡治于舒县之北。又汉舒县当孔道,六朝畏北兵,移治僻地。宋、齐舒县城徙东南,即今庐江县矣。隋因之,改县与郡同名。唐又因之。故章怀《后汉书注》云:“舒故城在今庐江县西。”以杜注、章怀之言度之:汉舒治今舒城界内,六朝之舒在今庐江县。隋无舒。唐开元后复置舒城,略当汉、晋故城之地。宋、元、明因之。
庐江属庐州府,盖得汉舒县东南并临湖地。	庐江属庐州府,盖得汉舒县东南并临湖之地。
无为州属庐州府,盖得汉居巢并襄安地。	无为州属庐州府,盖得汉居巢并襄安之地。

姚鼐之所以修改《沿革考》,既与该文内容、性质有关,又因其嘉庆七年参与了《庐州府志》的纂修。《沿革考》撰写于乾隆四十五年(1780),是姚鼐极为得意的考辨之作。此文立说与钱大昕论断有异,二人因此撰文辩论。乾隆五十九年,姚鼐以为“若此数郡,所论不过建置前后之异耳。得亦何足道,不得亦何足道?于世事之治乱,伦类之当从违,夫岂有所涉哉”,又觉钱氏“似有坚执己见、不复求审事实之病”^①,故不再与之争论,但还是写信跟弟子陈用光谈及此事。值得注意的是,信中云“若庐江则《招魂》固云‘路贯庐江’,又云‘哀江南’矣”,北大本恰好增入“《楚辞·招魂》曰:‘路贯庐江兮左长薄。’庐江之在江南古矣”云云,而国图本通篇未征引《楚辞》。直至嘉庆六年刊刻《文集》时,姚鼐都未修改此文,只将乾隆时旧稿编入集中。但恰恰在

①姚鼐:《惜抱轩尺牍》卷五《与陈硕士》,第 219 页。

《文集》刊刻的次年,姚鼐参与纂修了《庐州府志》。为考庐州之历代沿革,姚鼐为《庐州府志》作《沿革志》^①,“又以郡县沿革表及分野、疆域、形胜、风俗悉附于后”^②。《沿革考》论及庐江、九江之沿革,正与之相关。二文所用材料,多有重复,结论亦有因袭,如《沿革考》中舒城、庐江、无为州、巢县、合肥今属庐州府,《沿革志》亦称:“国朝为庐州府,初领州二、县六,今领县四、州一:合肥、舒城、庐江、无为州、巢县。”^③正因参与纂修《庐州府志》,姚鼐广泛搜集文献,对庐州沿革有了更深入的认识,故对《沿革考》加以修改,并增加了近千字关于庐江沿革的内容。嘉庆十四年,姚鼐再向弟子陈用光谈及此文时,更为自信地说道:“近时史学,无过钱辛楣,然吾有所辩论,殆足侑之。”^④

卷四《食旧堂集序》与《左仲郭浮渡诗序》文字也有所修改,且联系紧密。国图本卷四第三叶a面第7行作“子颖乃抄之曰食旧堂集将雕板传诸人鼐因为之序”,b面第4行作“他山为尤众然吾闻天下山水其形势皆以发天地之”、第5行作“秘其情性闾辟常隐然与人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”。《文集》每叶10行,行21字。北大本《左仲郭浮渡诗序》删去“然吾闻……闾辟”等22字,将“他山为尤众”与“常隐然与人心”句相连接后,共20字;又补入“之”字,使得该行21字得以完整。此时因文字删减尚空出一行,故又改动《食旧堂集序》末句为“子颖乃俾人抄为十几卷曰食旧堂集将雕板传诸人鼐因为之序”,使其多出5字,占一行以补空缺。

结合二本的差异与《文集》编纂过程,国图本不收姚鼐嘉庆七年五月所作《节孝张孺人传》;北大本文字修改与嘉庆七年姚鼐参与纂修《庐州府志》关系密切,但《文集》不收入本年十月所作《庐州府志序》,仅收入八月前后所作《何季甄家传》。所以,国图本应是嘉庆七年春间刊刻校改而成的初印本,北大本应是嘉庆七年秋间的后印本,这也解释了姚鼐何以于本年秋冬之际将《文集》“更以三部奉寄”给陈用光。

要之,嘉庆六年十月,姚鼐删定《文集》为十六卷,付之刊刻,年底书成。其后,姚鼐又加以校改,至嘉庆七年春间,《文集》刊刻完成、流通,是为国图本为代表的江宁刘文奎家原刻初印本。因本年参与《庐州府志》的纂修,姚

①“《六安志》尚未刻出,《庐州志》刻出矣。然惟‘沿革’一门出鼐手,余非所作。”(姚鼐:《惜抱轩尺牍》卷六《与陈硕士》,第246页)按:除了《沿革志》出自姚鼐之手外,《庐州府志》书首有姚氏嘉庆七年十月所作序一篇,此文收入《惜抱轩文后集》。

②张祥云等纂修:《〔嘉庆〕庐州府志》卷一《沿革志》,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安徽府县志辑》第1册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8年,第19页。

③张祥云等纂修:《〔嘉庆〕庐州府志》卷一《沿革志》,第23页。

④姚鼐:《惜抱轩尺牍》卷六《与陈硕士》,第292页。

鼐对《汉庐江九江二郡沿革考》进行挖改,补刻当时所作《节孝张孺人传》《何季甄家传》《陈谨斋家传》《方染露传》《程养斋暨子心之家传》。至秋,《惜抱轩文集》全部刻成,形成了今日所见北大本为代表的后印本面貌。

三、姚原绂翻刻《诗文集》

姚鼐诗文集不仅有其门人助其校阅、刊印,更有弟子翻刻、传布,后者以姚原绂为首。姚原绂,又名麟绂,字世纶,号兰泉,安徽桐城人。姚元之族父,姚希廉九世孙。师从姚鼐^①。嘉庆十年进士,嘉庆十一年姚原绂以庶常赴广东掌教粤秀书院,携带《惜抱轩诗文集》一册,“见者纷纷求索,而卒无以应”,“因集所得修资,重付剞劂”,而“卷帙仍旧,示无所增益”^②,至嘉庆十二年,此本刻成。

目前所见北京大学所藏姚原绂翻刻本《诗文集》共8册,馆藏号:X/810.7/4217。前4册为《惜抱轩文集》,第1册书首有篆书内封“嘉庆辛酉镌,惜抱轩文集”,次叶为姚原绂跋文;第5册书首有篆书内封“嘉庆戊午镌,惜抱轩诗集”^③。姚氏翻刻时,文字版式一仍原版,故《文集》《诗集》内封为初刻年份,实此两种刻成于嘉庆十二年。该书半叶10行,行21字。黑口,单鱼尾,左右双边。《文集》框高17.7厘米,宽12.6厘米,版心题“惜抱轩文集”,并有卷次、叶码;《诗集》框高18厘米,宽12.6厘米,版心题“惜抱轩诗集”,并有卷次、叶码。因其为翻刻,故《诗文集》目录末行各挖去“张烜、承德孙冯翼,江宁程有恒、吴刚校”“江宁刘文奎家镌”等字样。此翻刻本因民国时期被编入《四部丛刊》印行,故较为常见。

江宁刘文奎家镌原刻本《诗集》有初印本、中印本、后印本三种,姚原绂翻刻本收诗612题653首,与中印本收诗数量相当。而姚原绂翻刻本《文集》卷十收传文7篇,缺少《节孝张孺人传》等文,与《文集》原刻初印本数量相当。将姚原绂翻刻本分别与《惜抱轩诗集》《惜抱轩文集》原刻各印本相校,除明显因字形相近的讹误外,有如下异文,制成表2和表3:

①关于桐城姚氏世系及姚原绂相关情况,可参看汪孔丰:《麻溪姚氏与桐城派的演进》,安徽大学出版社,2017年。

②姚原绂:《惜抱诗文集·序》,嘉庆十二年(1807)刻本,北京大学图书馆藏,卷首。

③雷梦水《古书经眼录》云:“《惜抱轩诗集》十卷,清桐城姚鼐撰。嘉庆三年(戊午)刊。封面为正楷字,目录末行刻‘张烜、承德孙冯翼,江宁程有恒、吴刚校’一行,后印本则无,封面书名为篆体字。”(齐鲁书社,1984年,第153页)按:此说不甚准确,有篆书内封的《诗集》乃姚原绂翻刻本。

表 2 《惜抱轩诗集》原刻本、翻刻本异文表

诗题	内容	初印本	中印本	后印本	翻刻本
邳州黄山	我来芳草歇	芳	芳	芳	秋
良医行赠泾阳张孝廉	况年始逾冠加元	始	始	始	甫
隐仙菴……因赋	白雪千茎冷覆肩	肩	肩	肩	砖
送陈东浦……三十二韵	此岁嫩觔口	岁嫩	岁嫩	岁嫩	地朱
登松篁……及暮乃返	怅望西林隐半规		怅望	怅望	月上

表 3 《惜抱轩文集》原刻本、翻刻本异文表

篇名	内容	初印本	后印本	翻刻本
议兵	今之纷纷而呼于市	纷纷	纷纷	纷然
左仲郭浮渡诗序	而其西自寿春、合肥以 傅淮阴	西	西	间
孝经刊误书后	此章以申非先王…… 义也	此	此	一
孝经刊误书后	古孔氏分三章是也	古孔氏	古孔氏	艺文志
复蒋松如书	遂大为学术之害	遂	遂	因
印松亭家传	故求者虽频数	故求	故求	所给
明赠……张公祠碑文并序	抚其嗣人	嗣	嗣	居
赠武……何君墓志铭并序	前阻大山	阻	阻	临
副都统朱公墓志铭并序	夫人□衿	□	□	合
岷亭记	若独为是亭设也	设	设	见
祭刘海峰先生文	甘噬胸腊	胸	胸	乾

以上诸多差异,或是姚原绂翻刻过程中产生的,或是其所据底本与今日所见诸本不同。作为弟子的姚原绂翻刻时行款、版式等一仍其旧,应不会轻易删改文字。《文集》“间”“因”“所给”“临”“阻”“合衿”等异文关涉文义,并非因形近讹误等造成;且修改之处,原刻本文通理顺,较之翻刻本更佳,如《左仲郭浮渡诗序》云:“江水既合彭蠡,过九江而下,折而少北,益漫衍浩汗,而其西自寿春、合肥以傅淮阴。”“其”所指代为长江。长江自九江东北向而流,从寿春、合肥至淮阴大致在长江西侧,“西”字为佳,而“间”字不甚合文意。故知《文集》诸多差异应由姚鼐本人修改所致,姚原绂翻刻所据底本应与今日所见初印本不同。《文集》翻刻本与原刻初印本篇目数量一致,所收文章至迟作于嘉庆六年秋,又不收《节孝张孺人传》等文,则翻刻本所据底本

刊印时间应在嘉庆六年秋至嘉庆七年春间。根据上文所述姚鼐编刻《文集》的过程来看,《文集》仅有嘉庆七年初春前后及秋间两次修订。姚原绂翻刻所据底本的时间与前者吻合,版本之间差异又与“正在校改”“残缺数页”史实相呼应,故其翻刻所据底本应是未校改前的试印本^①。

至于《诗集》,《送陈东浦方伯自江宁移任安徽三十二韵》云:“此岁嫫訾口,他时北斗枢。”此句取典于《左传》襄公三十年“岁在嫫訾之口”,江宁刘文奎家原刻初印本、中印本、后印本均作“岁嫫”,说明此诗自嘉庆三年刊刻时起至嘉庆二十一年间板片未曾挖改,翻刻本所作“地朱”应是翻刻过程中产生的异文,非底本有异,所以姚原绂翻刻《诗集》所据底本应为嘉庆四年江宁刘文奎家镌中印本。产生文字差异的可能性较多,或是姚原绂所据《诗集》有所漫漶、难以认清,翻刻时据前后诗意改入。

要之,嘉庆十一年姚原绂携《惜抱轩诗文集》赴广东,因“见者纷纷求索,而卒无以应”,故集资翻刻,次年书成。通过对翻刻本面貌的分析及对校原刻本,可知姚氏翻刻时《文集》所据底本为嘉庆六年秋江宁刘文奎家刻试印本,《诗集》所据底本应为嘉庆四年秋江宁刘文奎家所镌中印本。《文集》间的差异,正是后来姚鼐校改所致。姚原绂翻刻本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其将姚学广播岭南,更在于间接地保存了《文集》试印本,补充完善了姚鼐诗文集纂刻流传的环节,进一步深化了对于不同印本的认识。

四、李际春、姚雉、梅曾亮续刻《诗文集》

《惜抱轩诗文集》刊刻完成后,姚鼐“复有所作诗文合可十卷”,但“侄意不欲更刻,或待死后并前更刻一全集耳”^②。嘉庆十年,弟子李际春为之刊刻《试帖诗》一卷。嘉庆十八年秋,姚椿计划为其续刻文集,所以姚鼐抄未入集古文约二百篇寄去。然姚椿家境稍窘,姚鼐又希冀弟子陈用光完成此事^③。“能合旧集编一全集最佳,但其费较大,只刻续集差易”^④。嘉庆二十年九月,

①姚原绂跋文云:“辛酉,先生掌钟山书院,学者吁求付梓,共裒辑得若干卷,而以古今体诗附其后。”辛酉是嘉庆六年,此年姚鼐改主安庆敬敷书院,不掌钟山书院。嘉庆六年刊刻《诗文集》,以《诗集》附其后的说法也是错误。之所以姚原绂有此“误解”,应该是因为他赴广州所携带的《惜抱轩诗文集》一册,诗文合刻、且《诗集》附于《文集》之后,书首可能有“嘉庆辛酉镌”的内封。《诗文集》正式刊印后,皆分订之。此一册之形态,亦应是“试印本”之证明。

②姚鼐:《惜抱先生尺牍补编》卷二《与香楠叔》,第461页。

③姚鼐:《惜抱轩尺牍》卷七《与陈硕士》,第313页。

④姚鼐:《惜抱轩尺牍》卷七《与陈硕士》,第315页。

姚鼐病逝于江宁钟山书院。之后姚雉、梅曾亮等人搜集遗作，续刻成《惜抱轩诗文后集》。

（一）李际春补刻《惜抱轩诗外集》

嘉庆十年十月二十八日，姚鼐写信给陈用光云：“《时文》十一月当刻成，又刻《试帖诗》一小卷，年内并可奉寄耳。”^①此后二人一直书信往来，频频提及《时文》与《试帖诗》的刊刻情况。嘉庆十一年二月十日，《时文》刻成，姚鼐寄给陈用光两部。至本年五月二十七日，姚鼐写信云：“有李生取吾《试帖》刻之，今以一卷五部奉寄。”^②此“《试帖》”即《惜抱轩诗外集》。因目录末行刻“受业李际春校”，故知“李生”为李际春。信中“今以”二字，正点明《试帖诗》于此前后方刊刻完成。书成之后，或独订一册^③，或与当年所刻《法帖题跋》三卷并装一册^④。目前所见北大本《惜抱轩诗外集》，装订于《惜抱轩诗后集》之后，盖《后集》刻成后重新改装。该本半叶10行，行21字。黑口，单鱼尾，左右双边。框高17.8厘米，宽12.5厘米。版心鱼尾下题“惜抱轩诗外集”，并有本卷页码。《惜抱轩诗外集》共收诗36题40首，其中《谢公墩》亦见于《惜抱轩诗集》卷九。

（二）姚雉编刻《诗后集》

姚鼐刊刻《诗集》后，复有题赠酬答之作，而“往往手写付人，不自留稿”^⑤。姚雉“日侍案侧，见有所作，辄私录成编”。至嘉庆二十年，姚鼐见其所录而删去三分之二。嘉庆二十一年，姚雉搜罗旧存，“得古体四首，近体八十四首”，又有姚鼐少时所作《咏白杜鹃花》《蜡梅》及“旧失其稿，而今始得者”，亦附后焉。因数量较少，故合词8阙编为《惜抱轩诗后集》一卷。目前所见天津图书馆所藏《惜抱轩诗后集》，附于《惜抱轩诗集》之后，合装一册。内封题“嘉庆丙子镌，惜抱轩诗后集”。半叶10行，行21字。黑口，单鱼尾，左右双边。框高17.5厘米，宽12.9厘米。版心题“惜抱轩文集”，并有卷次、本卷页码。此卷实收古体诗4题4首、今体诗57题75首、补遗11题16首、词7题8首。

（三）梅曾亮编刻《文后集》

在姚雉续刻《诗后集》的同时，姚椿将姚鼐所作古文与刻资寄给梅曾亮，嘱其刊刻。嘉庆二十一年，梅曾亮、管同等姚门弟子在南京钟山书院编校

①姚鼐：《惜抱轩尺牍》卷六《与陈硕士》，第255页。

②姚鼐：《惜抱轩尺牍》卷六《与陈硕士》，第261页。

③姚鼐：《惜抱轩尺牍》卷四《与周东屏》，第160页。

④姚鼐：《惜抱轩尺牍》卷三《与吴敦如》，第141页。

⑤姚雉：《惜抱轩诗后集·跋》，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）刻本，天津图书馆藏，叶二十二。本段所引皆据此。

《惜抱轩文后集》^①，至道光元年（1821）春二月刻成。目前所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翁同龢批注《惜抱轩文集》3册，馆藏号：06089。第1、2册为《惜抱轩文集》，第3册为《惜抱轩文后集》《法帖题跋》。半叶10行，行21字。黑口，单鱼尾，左右双边。框高17.5厘米，宽12.3厘米。版心题“惜抱轩文后集”，并有卷次、本卷页码。此本版框完整、文字清晰，应是初印本。山东省图书馆本版框多有缺损，文字亦多残泐，如卷三第三叶《复刘东明书》残缺数字，应是后印本。道光十七年，李祖陶辑《国朝文录》，至十九年刻成。其所收《复刘东明书》作“故能于此偏得其一二者俱能功到……”，初印本则作“故能于此见长耳。此两层俱能功到……”。李氏改窜如此，可见《文后集》书版至迟在道光十七年前后已有所损坏。

要之，姚鼐编刻《惜抱轩诗文集》后，其弟子亦不断为传播姚学、刊刻诗文集而继续努力。嘉庆十年，李际春补刻《惜抱轩诗外集》一卷，收诗帖诗36题40首，次年五月书成。嘉庆二十一年，姚雉续刻《惜抱轩诗后集》，收诗72题95首、词7题8首。同在本年，梅曾亮又编刻《惜抱轩文后集》十卷，道光元年二月书成。此诗文集五种，成为后来翻刻《惜抱轩诗文集》之源头，可谓影响深远、意义重大。

五、道光以降《惜抱轩全集》纂辑成书

姚鼐去世后，弟子陈用光孜孜于编刻《惜抱轩全集》。道光三年（1823），陈用光刊刻《惜抱轩尺牍》八卷，称“先生《经说》《诗文前后集》及《笔记》，虽皆已付梓，然各自为部……余尝欲他日总辑先生全集，以《四库书题识》入之题跋类，而《尺牍》则附之书简后焉”^②，则此时《惜抱轩诗文集》《九经说》等各自单行，而陈用光编辑《惜抱轩尺牍》亦是待“他日之编先生全集”。现存史料中并无确切记载陈用光最终是否编刻完成了全集，但就古籍实物而言，目前所见确有两种“特殊”的《惜抱轩全集》。

第一种为首都图书馆藏《惜抱轩十种》（以下简称“十种本”），馆藏号：乙四11，共4函24册。第1册书首有内封“姚姬传先生纂辑，惜抱轩十种，文前集、后集、法帖题跋、诗前集、后集、笔记、外集、九经说、国语补注、三传补注，本衙藏板”；第9册为《诗集》，书首有内封“嘉庆戊午镌，惜抱轩诗集”；第13册为《法帖题跋》，书首有内封“嘉庆丙寅镌，惜抱轩法帖题跋”；第14册为《笔记》，书首有内封“嘉庆庚辰年镌，惜抱轩笔记，版存金陵同善堂”；第16册为《九经说》，书首有内封“惜抱轩九经说，亦爱庐藏板”；第20册为《三

^①姚莹：《东溟外集》卷二《再覆汪尚书书》，第399页。

^②陈用光：《惜抱轩尺牍·序》，收入卢坡：《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》，第46页。

传补注》，书首有内封“嘉庆丁巳镌，春秋三传补注，国语补注附，钟山书院藏板”；第21册为《五言今体诗钞》，书首有内封“嘉庆戊辰重镌，五七言今体诗抄，桐城姚姬传定本”。中国国家图书馆亦收藏《惜抱轩十种》两部，分别为16册（馆藏号：38041）及20册（馆藏号：8571）。十种本以首都图书馆所藏相对完整，然此书《惜抱轩笔记》阙《刊姬传先生遗书跋》，且《国语补注》与《三传补注》分置两册。国图本（38041）缺少《法帖题跋》内封；国图本（8571）缺少《诗集》《笔记》等内封，又《文集》卷第二十三叶a面版阙数字，《文集》第16卷册叶装帧时次序混乱，第五叶误在第一叶后。此三部各册分卷、装订次序、残缺等又不尽相同，且皆与第1册书首内封所题顺序、分合不同。所收《五七言今体诗钞》两种，而内封亦不写明。

第二种为首都图书馆藏《惜抱轩全集》（以下简称“全集本”），馆藏号：丙四1619，共2函16册。第1册书首有内封“嘉庆丙辰镌，惜抱轩全集，文集、文后集、诗集、诗后集、外集、法帖题跋、左传补注、公羊补注、谷梁补注、国语补注、笔记、九经说、五言今体诗抄、七言今体诗抄”，其它各册皆无内封。北京大学图书馆也收藏有一部《惜抱轩全集》（见图1），馆藏号：X/081.57/4217a，共18册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残本《惜抱轩全集》，馆藏号：99250，共4册。全集本内封云“嘉庆丙辰镌”，而《三传补注》《国语补注》刻成于嘉庆二年^①，《法帖题跋》刻成于嘉庆十一年，《惜抱轩笔记》刻成于道光元年；《九经说》初刻于嘉庆元年，后又增刻成于嘉庆十四年；《五七言今体诗钞》初刻成于嘉庆三年、增刻成于嘉庆十四年，所以此内封说法实有失公允。在内容方面，首图本及北大本《文集》卷第二十三叶亦缺失。

此两种六部所收《诗文集》等各种，版框尺寸、行款、字体、内容皆与江宁刘文奎家镌本、亦爱庐藏刻本等原刻本一样，版片缺损处亦与之相同，乃至更甚于原刻，故知其皆是据原刻板片刷印而成的后印本，各书间差异是在印刷、装订时所产生的。又姚鼐诗文集版毁于咸同年间战乱，知其应为道光年间纂辑成书，当时书版已经磨损严重。

至于《全集》的纂辑出自何人之手，据版本特征及相关记载来看，前者应是姚鼐后人或弟子纂印，后者或出于书肆所为。姚永朴云：“公卒后，子孙及门人重雕，凡十种：曰《文集》，曰《文后集》，曰《诗集》，曰《诗后集》，曰《九经

^①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，陈用光曾刻《春秋说》《三传补注》，然“其所刻不全，雕手又极劣”，姚鼐意欲“他日另刻”（详参姚鼐：《惜抱轩尺牍续补·与刘台拱》，第515-516页）。嘉庆二年，江宁诸生为姚鼐重刻《三传补注》《国语补注》，书成后，内封题“嘉庆丁巳镌，春秋三传补注，国语补注附，钟山书院藏板”。此本即正式流通，姚鼐用以寄送友人、弟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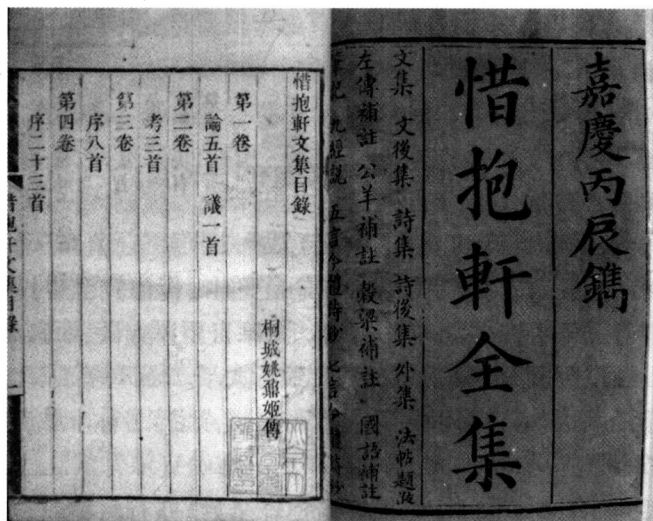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《惜抱轩全集》

说》，曰《笔记》，曰《三传补注》，曰《法帖题跋》。”^①姚氏所云“十种”正与“十种本”内封相合。又《惜抱轩诗文集》刊刻于江宁，道光元年梅曾亮刊刻《文后集》《笔记》仍在江宁，加之姚鼐晚年住在钟山书院；姚鼐长子姚景衡嘉庆辞官后，因生活所迫亦住在书院内^②，所以诗文集等书板应在姚氏后人手中而贮藏于钟山书院。十种本内封云“本衙藏版”，据前人考证，古籍中的“本衙”并非官刻本，而是私刻本书、本家藏板之义^③。再次，此十种为姚鼐生前编订，故汇集一书，内封称“姚姬传先生纂辑”“惜抱轩十种”。《五七言今体诗钞》虽是姚鼐生前编选注释，然古人著述分明，此两种与姚鼐所作诗文、经说等不类，故不入内封，仅附于书末。而姚景衡生活潦倒，管同谈及此云：“既而因事失官，寓江宁，穷益甚。始犹租屋以居，久负屋值，主人厌而逐焉，乃移家人书院。所居粪墙土舍，上穴旁穿，不蔽风雨。客至，则君衣垢衣。”^④或是迫于生计，姚氏后人变卖书版；或由他故，书版流入书肆。书商先是删

①姚永朴撰，张仁寿点校：《旧闻随笔》卷四《先世遗书》，黄山书社，2011年，第212页。

②关于姚景衡相关情况，可参看汪孔丰：《麻溪姚氏与桐城派的演进》第七章《业绍箕裘：姚景衡、姚莹与桐城派的发展》，第179-202页。

③关于古籍中“本衙藏版”的研究，可参看沈津：《说“本衙藏版”》，《书韵悠悠一脉香 沈津书目文献论集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139-147页；周绍良：《谈“本衙藏版”》，《细说红楼》，北京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295-299页；郭明芳：《再谈“本衙藏版”——从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藏〈刻袁中郎先生十集〉谈起》，《藏书家》第21辑，齐鲁书社，2016年，第41-42页。

④管同：《因寄轩文二集》卷五《姚庚甫集序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532册，第353页。

去各书内封,重刻内封置于《诗集》书首。为博噱头、获暴利,称“嘉庆丙辰镌”以彰其早,云“惜抱轩全集”以夸其全。此种板片缺损更加严重,印刷粗劣,各版本用纸甚差^①。

六、同治年间李瀚章重刊《诗文集》

咸同兵燹,《惜抱轩诗文集》书版毁于战火。同治五年(1866),李瀚章搜罗遗书,重作校勘,翻成新本,是为省心阁重刊本《惜抱轩全集》。李鸿章谈及此事称:“今天下言古文者,必宗桐城。盖肇自望溪方氏,而集成于惜抱姚先生。……独惜所撰辑诸书,兵兴而还,毁者大半。予开府江南,首刊《古文辞类纂》《五七言今体诗钞》,而《经说》《诗文》《杂著》号称十种者,予伯兄续刊于湖广节署。”^②

前人并未注意到李瀚章重刊本《惜抱轩全集》亦有两种版本:北京大学图书馆藏《惜抱轩全集》16册(以下简称“北大甲本”),馆藏号:X/817.743/4217.2/C1。半叶10行,行21字。白口,单鱼尾,左右双边。鱼尾上题“惜抱轩集”,下注明各册种类、卷次、本卷页码。书首内封题“惜抱轩全集”,次叶有“同治丙寅省心阁重刊”牌记,再次叶为李瀚章同治五年识语。又次叶为《惜抱轩总目录》,分别是“文集、文后集、诗集、诗后集、外集、法帖题跋、左传补注、公羊补注、谷梁补注、国语补注、笔记、九经说、五言今体诗抄、七言今体诗抄”;紧接着是诗文集等各种目录、正文。其中《文集》框高17.2厘米,宽12.5厘米;《文后集》框高17.6厘米,宽12.4厘米;《诗集》框高17.5厘米,宽12.5厘米;《诗后集》框高17.5厘米,宽12.6厘米;《诗外集》框高17.5厘米,宽12.6厘米。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另一种《惜抱轩全集》16册(以下简称“北大乙本”),索书号:X/817.743/4217.1/C5。书首亦有“惜抱轩全集”内封、重刊牌记、李瀚章识语,其行款、版式、所收书种类等皆与前一种同,但字体、框高稍有异,尤其此种《文集》框高17.8厘米,宽12.6厘米;《诗集》框高18厘米,宽12.5厘米。此两种在文字内容上亦有所不同,后一种与江宁刘文奎家镌《诗文集》五种后印本基本相同,前一种则文字多有不合;但两种亦有文字相同,而与《诗文集》不合之处,如《惜抱轩文后集》原刻本卷七云:“光禄在扬州,以君葬昔阙志,俾秉绶求追为之。”“扬州”二字,以上两种省心阁本均作“石州”。从两本字体及文字内容之继承与变更来看,

^①《惜抱轩文后集》卷第二十三叶板片道光时期即有毁损,现存道光时期刻本残缺数字。

笔者目验国家图书馆、首都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《十种》本,此叶或残损、或缺失,而《全集》本皆缺失,疑此叶书板毁坏严重,或流入书肆时版片已经丢失。

^②李鸿章:《惜抱先生尺牍补编·序》,收入卢坡:《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》,第372页。

后一种显系据前一种挖改翻刻而成。

两种省心阁本卷首李瀚章识语则能进一步揭示其刊刻《惜抱轩全集》之过程以及二者关系。是文云:“此书刻竣,坊间已印行矣。偶阅一过,觉鲁鱼亥豕,触处皆是,因复详加厘正,命工重印,较先印者为善。然校书如扫落叶,未必一无讹,大雅宏达,尚其匡之。同治五年十月朔日,李瀚章记。”由此得知,《惜抱轩全集》书版刊刻完成后,坊间先印行,即“先印者”,然此本“鲁鱼亥豕,触处皆是”,李瀚章遂复加校勘,遂有后印本。所以带有李瀚章识语的北大甲本应是后印本,至于“先印者”是否存世,尚不得知。但即便后印本“详加厘正”,仍然错讹较多,如《文后集》卷一《泰山道里记序》云:“各考纪其地土之实,据以参相校订,则天下地志何患不善?余尝以是语告人,嘉定钱辛楣学士、上元严东有侍读……”“据”,北大甲本误作“蹟”;“患”,误作“往”;“有”,误作“任”;乃至下文“济南”,亦误作“济两”。此外,北大甲本刊刻亦不精良,如《诗集》卷四第九叶a面第1、2行字体大小不一。正因如此,李瀚章又重作校勘,翻刻作新本,即北大乙本。此本不仅改正了北大甲本的错讹,亦补全了相关墨钉,同时刊刻更为精良。

李瀚章所刊刻省心阁本,影响极为深远。光绪九年(1883),徐宗亮因省心阁重刊本“翻雕于楚而不常印行海内”,遂取《惜抱轩文集》《惜抱轩文后集》别为校刊,款目次第一依原书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徐氏刊本《惜抱轩文集》共8册,馆藏号:103027。书首题名“惜抱轩文集十六卷,后集十卷”,次叶内封题“光绪癸未仲夏月桐城徐氏重校刊”。另有一种书首分别题“惜抱轩文集”“惜抱轩文后集”。卷前抄录《国史馆文苑传》“姚鼐,安徽桐城人”云云,后有徐宗亮识语。半叶10行,行21字。黑口,单鱼尾,左右双边。框高14.3厘米,宽10.2厘米。版心题“惜抱轩文集”,并有卷次、本卷页码。经比勘,所据底本为刘文奎所刻《惜抱轩文集》后印增刻本。《文后集》卷三《复刘明东书》残缺数字,徐宗亮一一为之补刻,但字体稍异于本叶其它文字。光绪三十年(1904),朱记荣购置铅石印机、精刊木板,在上海大东门大街开设校经山房^①。三十三年(1907),校经山房采用石印方式印刷《惜抱轩全集》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石印本,馆藏号:40994,共计20册,框高17.7厘米,宽12.5厘米。该书书首内封、李瀚章识语、正文行款、文字内容等皆与省心阁本相同,惟“同治丙寅省心阁重刊”牌记被替换为“光绪丁未上海大东门内校经山房重刻”。经比勘,校经山房本石印所据底本为省心阁重刊本之翻刻本。民国三年(1914),上海会文书局翻印《惜抱轩全集》,即所谓“会文

^①杨丽莹:《扫叶山房史研究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3年,第109页。

堂本”,亦是以省心阁重刊本之翻刻本为底本^①。不仅如此,省心阁本更是影响了建国以来姚鼐诗文集的整理与研究。1992年,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刘季高点校的《惜抱轩诗文集》,共收《文集》《文后集》《诗集》《诗后集》《诗外集》五种。《前言》称:“省心阁本刊行之日,正当东南兵燹之余,书籍多成灰烬,致校勘极为不易,鲁鱼亥豕,触目皆是。校经山房本虽略加校正,亦未见完善。所幸尚有《丛刊》《备要》及江宁刘氏家镌本残刻(简称刘本),可资校订。故这次整理诗文集,即以之作底本。”^②此本为建国以来《惜抱轩诗文集》第一次全面整理标点本,流传广泛。经比勘,此书所据底本为省心阁重刊本之原刻后印本,故书中错讹甚多。

要之,同治五年,李瀚章因《惜抱轩诗文集》书版毁于兵燹,故重作校勘,另刻新本,是为省心阁本。省心阁本有原刻与翻刻之分,原刻又有初印和后印之分。原刻后印本较之初印本校改颇多,但仍存在较多讹误;翻刻本不仅改正了原刻本许多错讹,而且刊刻更为精良。省心阁本影响极为深远,上海校经山房、会文书局皆据省心阁重刊本之翻刻本印行了《惜抱轩全集》。而目前学界普遍使用的《惜抱轩诗文集》,实据省心阁重刊本之原刻后印本整理而成,故书中错讹甚多。

七、余论

乾隆三十九年,姚鼐借病辞官,次年离京归乡。其后,他设帐敬敷、紫阳、钟山等书院,创作辞章、讲学育人、构建文统。乾隆五十四年,姚门知名弟子次第来归。乾隆五十七年,弟子陈用光刊刻《惜抱轩文集》十卷,欲为其传播。嘉庆二年至七年,姚鼐手订、修改、增补诗集十卷、文集十六卷,张炯、孙冯翼、程有恒、吴刚、孙金相、伍光瑜、谈承基,焦若鈺、唐大沛、吴翼元等门人助其校阅、刊印,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印本。此后,门人李际春补刻《惜抱轩诗外集》、姚雉续刻《惜抱轩诗后集》,梅曾亮又续刻《惜抱轩文后集》,最终形成了诗文集五种,成为后来翻刻《惜抱轩诗文集》之源头。从绛帐寂寂到陈用光与校阅诗文集之数人、再到梅曾亮等人,姚学之队伍逐渐扩大,桐城学人之群体逐渐形成。

同时《惜抱轩诗文集》不只是一部简单的清人诗文集,更是姚鼐构建文

^①1920年,为了与商务印书馆竞争,中华书局开始编印《四部备要》,其中《惜抱轩全集》所据底本综合姚原绂翻刻本、会文堂本。1936年,世界书局又据会文堂本排印、标点,出版了《惜抱轩全集》1册。1991年,中国书店又影印出版了世界书局本《惜抱轩全集》。关于民国时期《惜抱轩诗文集》的印行、出版情况,笔者另有专文说明。

^②姚鼐著,刘季高标校:《惜抱轩诗文集·前言》,第9-10页。

